

文学伦理学批评话语建构：历史、论争与前景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History, Arguments and Prospects

李茂增（Li Maozeng） 温 华（Wen Hua）

内容摘要：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建构经历了两个阶段：2004—2010年主要立足国内，进行基本的理论建设；2012年之后，以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的成立为标志，开始逐步走向世界，通过历次国际学术会议，将这一批评话语的影响推向了国际学界。这一批评话语在建构之初曾出现基本概念易混淆、过分强调本土性等问题，随着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克服了部分问题。但它在显示出旺盛活力和强大阐释力的同时，基本理论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话语建构；脑文本；道德批评

作者简介：李茂增，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理论与批评；温华，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Title: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History, Arguments and Prospect

Abstract: As a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goes through two stages. From 2004 to 2010, it mainly exists in domestic context, whose basic concepts and the frameworks were proposed by Nie Zhenzhao and other scholars. After 2012,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rough successiv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this theory has exerted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imp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heory, such deficiencies as the confusion of concepts and the overemphasis on locality have been overcome. While showing strong vitality and explanatory power, the basic theory construction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Key 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discourse construction; brain text; moral criticism

Author: Li Maozeng, Professor at Center of Literary Theor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His research area is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lit-

erature and art (Email: Lmz69@sina.com). Wen Hua, Associate Professor at Luoy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the PLA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Luoyang 471003,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is comparative and world literature (Email:wenerxi@sina.com).

自从1996年“失语论”提出以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一直是学界挥之不去的执念。对于如何在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三重话语传统中建立真正适应当下语境和彰显本土文化特色的批评话语，学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实际上，从“西学东渐”起，建构本土话语就是中国知识界努力的方向，百余年中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经验。例如王国维兼收中西美学独创“境界说”；宗白华融合古代文论与德国生命哲学提出“散步”美学；毛泽东在创造性吸收马列文论基础上，建构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具有强烈政治色彩、民族意识与现实性的阶级分析话语系统；钱中文受巴赫金对话理论启发提出“新理性精神”和文艺学的“现代性”理论……这些尝试虽不一定产生了国际影响，却代表了中国学界立足时代和现实建构本土文学批评话语的努力。

新世纪以来，随着学术积累的不断增长，学界本土意识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满足于中国学界作为西方理论消费国的角色，尝试建立适应中国语境的理论话语，在国际学界发出独特的声音。不可否认，中国学术在很多方面还落后于西方，我们的学习时代还远未结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学术研究中紧扣本土问题，按照自身需要借鉴、吸收甚至改写西方理论话语，为国际学界提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在诸多话语建构实践中，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唯一产生于外国文学研究界的一种。经过聂珍钊等学者十多年的精心打造，它不仅在国内学界蔚为大观，更打开了与国际学界对话交流的路径。尽管这一话语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还不尽完善，且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些争议，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文学伦理学批评是目前中国学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声音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回顾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话语建构过程，思考其话语体系的得与失，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话语提供借鉴。

一、2004—2010年：话语初创期

2004年6月，在《外国文学研究》与江西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聂珍钊作了题为“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大会发言，揭开了国内学界建构这种新批评话语的序幕。发言构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框架，确立了这种批评方法的理论基础、批评对象、思想与文学渊源，并特别指出伦理学方法一直被有意无意地用于文学批评，但国内外都没有人将其作为文学批评方法明确

提出（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23）。此后，《外国文学研究》于2005年第1期开设“文学伦理学批评”专栏，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克努特、国内学者王宁、刘建军等纷纷撰文发表各自看法。2005年10月，《外国文学研究》与东北师范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全国学术研讨会，这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之后的首次全国性学术会议。此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建构者以《外国文学研究》为主要阵地，通过每年一到两次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不断呐喊与实践，逐渐让这一话语广为学界所知。

在早期的文章中，主要建构者聂珍钊一直着重强调这种批评方法的原创性、本土性、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性。聂珍钊认为：“自从有了文学以来，伦理学方法尽管都在广泛地被有意或无意地用来批评文学，但遗憾的是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还没有人明确地把它作为批评文学的方法提出来”（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23）。必须承认，这种看法其实值得商榷，“伦理批评”在国外也许确实算不上一种声势浩大的理论流派，但早已有学者肯定了它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价值，并且进行了系统化的建构。诺思罗普·弗莱在1957年出版的《批评的解剖》中已经指出：伦理批评可以包容历史批评、原型批评、修辞批评三种批评方法，具有整体阐释的效力。九十年代以来，以韦恩·布斯、希利斯·米勒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分别致力于从新人文主义、解构主义角度建设文学伦理批评，“伦理批评”(ethical criticism)一词频繁出现于美国学界的文学研究专著与论文当中，以至于有人将1990年文学理论的变化命名为“伦理转向”年(Jane Adamson 1-17)。其实，对于西方学界的相关动态，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建构者是有相当了解的，比如刘建军等学者都曾提到美国学界的伦理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聂珍钊在2010年前的所有文章中，几乎完全不曾提及西方学界伦理批评的现状，而是一再突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原创性和本土性。我们无意批评这种忽略，因为很显然，这是一种“有意”的忽略，或者说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理论姿态，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当代中国学界试图摆脱西方影响、建设本土理论的焦虑和努力。在解释倡导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原因时，聂珍钊一再强调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几乎全部来自西方，缺少原创的文学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乃是改变理论方法西化倾向的新尝试（聂珍钊，《序言：文学伦理学批评》1）。聂珍钊强调的第二个理由是，当下的文学研究存在着过分注重理论而忽视文本分析的倾向，而这依然是受西方理论影响的结果。聂珍钊认为：“后现代批评、精神分析以及其他一些从西方新近引入的批评方法和理论，往往都有忽视文学作品伦理价值的倾向”，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受其影响，也普遍地忽视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缺少人文关怀（黄开红 117）。文学伦理学批评正是要匡正这种流弊，重振文学的教诲功能。不难看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建构动机中倾注着极其强烈的本土话语意识。如

聂珍钊所言：“我们倡导文学伦理学批评，其目的就在于为我们的文学研究方法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在西方批评话语中加入一些自己的声音”（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9）。

作为一种意在彰显话语特色的策略，倡导者在初创期对理论本土性和原创性的强调，显然达到了预期效果，文学伦理学批评很快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此同时，对于这一方法的“本土性”，学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论者以西方学界研究现状为对照，认为“我国的文学伦理批评是西方相关研究的滞后反应”（段俊晖87）。面对质疑，建构者做出了回应。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阵地，《外国文学研究》刊发了介绍美国伦理批评现状的文章（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9—17）。聂珍钊也在学术演讲中提到韦恩·布斯的伦理批评，但依然认为布斯的伦理批评与中国学界建构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不同，是一种道德批判。¹不过，这一判断依然是建立在对布斯伦理批评“误读”的基础上的。在《我们的朋友：小说伦理学》中，布斯详细辨析了自己的伦理批评与传统道德批评的差别，而布斯对道德批评的批判与聂教授对布斯伦理批评的认识非常相似（Wayne C. Booth 7-8）。显然，这一误读还是出于建构者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本土性的坚持。换个角度，也许可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话语的提出和早期建构，的确没有受到西方学界的直接影响，而是学者们紧扣中国的现实问题，吸纳注重教化的文化传统营养，独立思考之所得。但同样无庸置疑的是，在话语建构过程中，对“本土性”和“原创性”的强调在慢慢淡化。其实聂珍钊教授本人在这一阶段一直与国外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06—2007年间赴美国访学期间，还曾就哈姆雷特抉择困境的伦理原因与美国学者有过深入交流，加深了对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思考（聂珍钊，《勤学求真，创新求是：漫谈我的治学之路》3）。当然，这一说法是数年之后的“追认”，在理论建构之初，对西方的借鉴非但不可能被纳入到话语策略之中，反倒是要刻意规避的。

客观地说，忽略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话语策略固然能够凸显其“本土性”，却不利于更开放、更深入的学术交流。因此，当理论渐趋成熟、建构者试图将这一批评话语推向世界时，便自然而然地放弃了这一话语策略。

二、2010年之后：理论深化与走向世界

2010年，聂珍钊在《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发表文章《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全面论述了其文学本质观和文学功能论。文章认为，文学并非审美意识形态，而是伦理的艺术，教诲是文学的本质属性，也是第一功能。“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判断，本来是中国学界较为认可的一种文学本质论，在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中被广泛采用。但聂教授认为这种观点并

¹ 2011年12月22日聂教授在上海大学题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批评实践”的讲座中所言。

非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它否认了文学作为文本形式存在的物质属性；审美也并非文学的第一功能，只有与教诲功能结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由此出发，文革认为，伦理学批评不仅仅是众多批评方法中的一种，还是文学本质所决定的最有效、最切题的批评方法。这种观点显然是对初期看法的极大发展。最初，聂教授还认为这种批评方法的理论基础在于伦理学与文学关注的问题相近相通，并未将伦理关怀视为文学的本质，因此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只是众多文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而并非文学本质所决定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这种观点的变化表明，建构者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绝不仅是为众声喧哗的学界提供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而是怀着更为宏大的理论诉求，意欲全面系统地建构起一整套相关的文学理论体系和批评话语。第二阶段的理论建构目标，就是将文学伦理学批评从方法论拓展为包括文学本质论、功能论及价值论的系统理论体系。也许有人会不同意其具体观点，但谁都无法否认，这种追求在理论退热、缺少方向的当下学界弥足珍贵。

与第一阶段刻意忽略国外学界的相关话语实践相比，建构者在这一阶段调整了话语策略，变忽略为了解，进而主动展开对话。一大变化就是《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多篇介绍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文章，2011年聂珍钊还指导学生完成了博士论文《美国伦理批评研究》，全面梳理探究美国学界的相关研究。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建构者与国际学界展开了全方位的互动交流。建构者不再特别强调这一话语的“原创性”，而确认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在借鉴西方伦理批评和中国道德批评的基础上创建的文学批评方法”（聂珍钊，《勤学求真，创新求是：漫谈我的治学之路》⁶）同时，依然强调这种话语的创新性，强调中国学者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概念的原创者身份。

2012年12月，“第二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学伦理学批评话语走向了世界。此次会议，有来自中国、挪威、爱沙尼亚、葡萄牙、美国、韩国、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1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宣布成立“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吴元迈任会长，副会长分别由中、韩、挪威及爱沙尼亚学者担任¹。此后，“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每年举办一次，截止目前，已经在中国宁波、上海、韩国首尔、爱沙尼亚塔尔图、英国伦敦成功举办七届。在历次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对这一批评话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积极参与到话语批评实践当中，拓展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视野和实践空间。国际学界知名学者玛乔瑞·帕洛夫、查尔斯·伯恩斯坦、安斯加·纽宁纷纷表达对这一批评方法的认可。同时，世界知名学术杂志与期刊《泰晤士文学副刊》、《阿卡

¹ 据聂珍钊介绍，副会长分别来自美国、俄罗斯、挪威、韩国和爱沙尼亚，参见聂珍钊：《勤学求真，创新求是：漫谈我的治学之路》，《当代外语研究》2014年第11期，另见《“第二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1期。两文略有出入。

狄亚》、《英语语言与文学》都刊发文章甚至开设专栏进行介绍。2015年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举办的“批评理论学术年会”，聚集了当代美国最杰出的学者，会议专门开设一个专题讨论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批评理论建构。欧文分校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邓·阿贝勒指出，“在西语理论过于倚重政治话语的当下，文学伦理学批评对于文学批评向德育和审美功能的回归提供了动力，与西方主流批评话语形成互动与互补的关系。”（夏延华，邓·阿贝勒 172）他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必将在中西学者的共建中得到进一步的系统化。

综上，在第二阶段，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建构重心转向与国际学界接轨并对话，扩大国际影响，同时试图将理论体系化。应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业已引起了国际学界的注意，但其中的一些具体观点还不乏争议，理论的体系化仍需加强。

三、问题与讨论

在话语建构的第二阶段，建构者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和术语进行了全方位的拓展，创造了“伦理线”、“伦理结”、“斯芬克斯因子”、“人性因子”、“兽性因子”、“物质文本”、“脑文本”等概念，提出了包括文学表达论、文学文本论、文学物质论、文学教诲论在内的一系列观点和命题，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张连桥，161—162）。然而，由于有些观点与学界主流看法多有不同，甚至颇具“颠覆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争议与讨论。

（一）文学不是意识形态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和术语》这篇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奠基立派的文章中，聂珍钊教授开篇即对“文学是意识形态”这一习见的命题提出了质疑。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聂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物质第一性原理出发，以文学物质论取代了文学意识形态论。聂教授认为，一切文学均是以文字文本为载体的，“没有文字就没有文本，没有文本则没有文学。”在录音技术和电子技术出现后，又出现了声音文本和电子文本。总之，文学只能是以具体的物质文本形式存在的文学，口头文学实际上是口头表演，属于表演艺术，还不成其为文学。因此，“文学作品不是抽象的，不是精神的，不是观念的，不是语言的，更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审美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借助文本存在的物质形态。”文学意识形态论恰恰忽视了文学是一种物质存在，因而是错误的。

有批评者提出质疑：如果文本是文学作品的唯一存在形式，而口头文学因此不足以成其为文学，那么众多民族早期的文化遗产如《吉尔伽美什》《荷马史诗》等，在被文本固定下来之前是否也就没有资格成其为文学？为了回应这一诘难，聂珍钊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这一概念，指出口头文学一词并未正确定义口头讲述的故事，真正的文学是以口头形式讲述的脑文本。

所谓脑文本，“指的是存储在人的大脑中的文本。口头文学的脑文本是人类在发明书写符号并以书写方式存储信息之前的文本形式”（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29–30）。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一系列概念中，“脑文本”可谓最具原创性与独特性，也是聂教授近年来用力最多的理论。这一理论为口头文学的物质性提供了新颖的解释，有力地回应了批评者的质疑。但置诸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之中，则仍须追问：所谓“脑文本”能否归诸于物质形式？如果“脑文本”能够算作物质存在的话，那么，同样以“脑文本”形式存在的某种思想、观念，能否算作物质存在？进而言之，从“文学只能以物质形式存在”，是否可以得出“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结论？聂教授的答案是否定的，其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的首要问题是意识还是物质的第一性问题，也就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首先应该是文学文本决定意识形态还是意识形态决定文学文本的问题，即文学文本还是意识形态第一性的问题”（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和术语》16）。但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物质第一性是指，无论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还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相反，意识却必须受前者的决定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观念的东西，都是对广义的物质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反映的结果。至于文学作品的文本，只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的载体、媒介。换言之，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意识形态是其本质，而文本只是其存在形式。其实，聂教授的表述，也证明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伦理性）是先于其文本形式的：“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文学的产生源于人类伦理表达的需要，它从人类伦理观念的文本转换而来，其动力来源于人类共享道德经验的渴望。”“人类为了表达自己的伦理意识，逐渐在实践中创造了文字，然后借助文字记载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事例，阐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从而把抽象的和随着记忆消失的生活故事变成了由文字组成的文本，用于人类生活的参考或生活指南。”（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和术语》14）也就是说，文学是对伦理观念的文本转换；是伦理观念（意识形态）在先，文本转换在后。

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所说的“伦理”是一个泛称，它并不限于狭隘的社会伦理，还包括政治、宗教等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诚如聂教授所说：“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和术语使用中，伦理的基本涵义同伦理学中伦理的涵义有所不同，它主要指社会体系以及人与社会和人之间客观存在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在现代观念中，伦理还包括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和术语》17）。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批评乃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否认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伦理学批评将难以深入展开。

(二) 文学不是审美的艺术

与反对文学是意识形态相一致，文学伦理学批评反对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也反对文学是审美的艺术。“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审美不是文学的属性，而是文学的功能，是文学功利实现的媒介。任何文学作品都带有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就是教诲”（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7）。在文学伦理学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无功利的文学，“如果对文学发展的历史细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不仅从来都是功利的，而且文学的政治倾向性一直是文学的基本特征。即使在唯美主义作家的创作中，非功利的文学也只是一种乌托邦理想，因为他们的创作从来也没有超越道德，带有明显的道德说教特征”（聂珍钊，《谈文学的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13）。聂珍钊认为，“审美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审美”就意味着“无功利”，而意识形态恰恰是功利的。

聂珍钊对文学审美论的批判，牵涉到文学的本质属性这一古老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历来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文学是无功利的、审美的，以康德美学为代表；一种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功利的，儒家的“文以载道”论和柏拉图的理论可为代表；一种是调和论，认为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其直接的无功利性、形象性、情感性总是与深层的功利性、理性和认识性等交织在一起。如果从目的、方式和态度三方面来看，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表现为无功利性与功利性、形象性与理性、情感性与认识性的相互渗透状况”（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和术语》16）。童庆炳是这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代表。

本文无意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总体上说，我们赞同聂教授的立场，即认为不存在完全无功利的文学；我们也认同聂教授的看法：文学审美论的大行其道，是造成当代中国文学“伦理缺失”的主要原因。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审美论和调和论在当代中国的出现，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审美论和调和论之所以在八十年代不遗余力地标举文学的无功利性，是出于长期以来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强烈排斥和不满；二者之所以强烈反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学观，是因为曾经吃尽“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的苦头，特别担心历史会再次重演。对于许多人来说，远离“道德”与远离“政治”是一回事，呼唤文学的道德教诲功能，极有可能会唤回“道德绑架”、“政治绑架”的幽灵。指出两种理论出现的历史背景，并不是为了得出存在即合理的结论，为两种理论辩护，而是为了提醒文学伦理学的倡导者，文学伦理学批评毕竟是一种文学批评，如果不能结合文学自身的特点对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批评方法做出说明，这种批评就有滑向简单、粗暴的说教式批评的危险。不得不指出的是，或许是为了更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理论立场，聂教授常常刻意贬抑文学的审美特性：“我们通过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而得到教诲的过程，就是审美的过程，教诲的实现就是审美的结果，因此，教诲是文学的本质属性，

而审美只是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感受文学作品、理解文学作品而获取教诲的一种方式，一种手段、媒介。”将受教诲直接等同于审美，作为一种论争策略，这种矫枉过正式的论断可以理解，但从理论的长远建设来看，则必须要有更为详尽有力的论证。

（三）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

文学伦理学批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道德批评。中西方都曾有过强大的道德批评传统，对文学人物评头论足，进行善恶归类；对文学作品的趣味、道德、价值分析考量，做出是非判断，堪称最古老的一种批评方式。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道德批评虽然表面上不如一些时髦理论那么引人注目，但实际仍然是最为基本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作为一种旨在创新的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到底有什么不同？聂珍钊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道德批评往往以今天的道德标准对历史上的文学作品进行好坏判断，文学伦理学批评主张回到历史情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文学伦理学批评同道德批评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历史客观性”（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4）。第二，道德批评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行动本身和行动的结果，重在对行动及结果进行善恶评判，文学伦理学批评则以历史主义的立场看待文学作品中表现的伦理关系，重在分析、阐释和理解，“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运用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文学中的道德现象，倾向于在历史的客观环境中去分析、理解和阐释文学中的各种道德现象”（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16）。第三，道德批评的目的是以文学阐释道德，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对文学作品价值的发现。在道德批评中，“批评家个人的道德立场、时代的道德标准就必然影响到对文学的评价，文学往往被用来诠释批评家的道德观念……这种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批评家阐释文学，而成了文学阐释批评家，即文学阐释批评家所代表的一个时代的道德观念。”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强调，“文学伦理学批评目的在于通过对文学文本的阅读与分析，从而获取新的认识与理解。……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不在于维护已经形成的观点或看法，而在于努力获取新的认识和理解以超越前人，从而把前人的批评向前推动。”（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22）。

聂教授还通过对哈姆雷特延宕的具体分析，展示了文学伦理学与道德批评的区别。聂教授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得出新解：延宕是由于哈姆雷特无法解决的一系列伦理问题引起的。所谓“*To be or not to be*”，并非如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源于生与死的思考，而是哈姆雷特面临两难伦理选择时关于行动对与错的追问，这个两难选择就是：为亲生父亲复仇是其伦理责任与义务，而一旦复仇则违犯了弑君与弑继父的伦理禁忌。传统的道德批评多批评哈姆雷特性格优柔寡断，责备他对奥菲莉娅薄情，文学伦理学批评则通过细究延宕背后的原因，发现他的毁灭是在崇尚理性的文艺复兴时代，因不能

用理性解决自身遭遇的伦理问题而导致的悲剧。

应当说，聂教授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正面立论是清晰的、自洽的，但对道德批评的批判则失之过苛。聂教授认为道德批评的一大缺失，是以己度人，即批评者往往以自己或时代的道德标准对历史上的文学作品进行评判，完全无视作品产生的历史情境，这诚然是庸俗的、教条的道德批评者的痼疾，但无庸讳言，强调以历史的眼光对文学作品进行道德批评的也不乏其例。如孟子“知人论世”说，就特别强调“颂其诗，读其书”，要“知其人，论其世。”陈寅恪主张研究古代学说，应具“同情之了解”，虽是讲治学方法，但也未尝不可移诸于文学研究。马克思指出，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时，既要坚持美学的原则，也要坚持历史的原则。至于当代文学批评流派中的知识考古学、新历史主义等，更是特别强调历史化的研究方法。

不仅如此，以自己或时代的道德标准对历史上的文学作品进行评判，也并不能一概否定。当聂教授强调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文学文本的阅读与分析，从而获取新的认识与理解”时，其所谓“新的认识与理解”，其实正有赖于批评者基于自身或当下的道德标准对文学作品的评判。在《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一文中，聂教授认为，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主要原因在于它能够不断地为我们提供伦理阐释的可能。比如《老人与海》，在海明威的时代，人类奉行征服自然和战胜自然的传统观念，因此评论家从中概括出一种“硬汉”哲学；而在生态失衡的今天，我们又完全可以把圣地亚哥释读为生态破坏者。显然，对《老人与海》的生态解读，所依据的正是现时代的道德标准。更不要说，当我们面对的不是历史上的文学作品，而是当代文学作品时，我们当然只能依据当下的道德标准进行判断。

由此可见，依据上述三条原则，并不能将文学伦理学批评和道德批评完全区分开来。这说明，如何进一步明确与相关批评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区别，仍然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过思考。王鸿生认为，作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批评方法，当代伦理批评与传统道德批评的主要区别是：“其一，批评依据不同。传统道德批评的价值尺度是理性的、绝对的、一元性给定的，伦理批评的价值尺度则是在经验（先验）与超验悖论式偶在的相关性中自由抉择的；其二，批评方式不同。传统道德批评是说教的、权威的、单一外指向的，故不能出示道德困境，伦理批评则是对话的、抗拒权力的、自我相关的，故只能在道德与否的伦理追问中达成道德的自觉，即使追问得不到终极解答，但追问本身已显示批评的德性；其三，批评视域不同。传统道德批评无意也无力介入文本结构或审美形式，伦理批评不但要深入话语层面考察其伦理意义，还要对语构、语式、语象、语调、语气等进行修辞伦理的探讨；其四，批评语态及其效果不同。传统道德批评注重‘应该’，语态往

往往是断言式的、谴责的或颂扬的、威胁的和道德归罪的，伦理批评注重‘可能’，所以语态是开放的、质疑的或反省的、分析的和道德触动的”（王鸿生 43-50）。张杰、刘增美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应该是一种敞开式的对话批评。它不是在对读者进行道德说教，而是不断提出问题，引发读者思考，与读者对话”（张杰，刘增美 137）。诸如此类的思考和建议，值得重视。

四、一种展望

在当下中国学界，还有一种理论话语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境况不同但问题相似，那就是文艺理论界童庆炳倡导的“文化诗学”。目前，“文化诗学”已经形成了比较明晰的理论观点和操作方案，实践效果也得到了学界肯定。这一话语的建构也贯穿着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特别体现出中国文化特有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尤其是它强烈的本土性和现实性，传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但是，“文化诗学”虽志在发出独特的声音，影响仍然局限于中国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当中，缺少更大范围的回应，更缺少与国际学界的互动交流，“中国视角”的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与之相比，文学伦理学批评走向世界脚步显然更为迅速和顺利，已经引起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让更多的国际同行见识了“中国立场”。但是两种话语的建构与传播分别局限于外国文学研究和文艺学研究两个相对固定的学术共同体之内，与共同体之外的学科交流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学界对两种话语的认可和接受。

当我们跳出学科壁垒，就会发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建构者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当代文学界与理论界的诸多学者在为伦理批评摇旗呐喊。¹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同样怀抱着对现实的深刻关切，同样对文学批评中的伦理缺位有着痛彻忧虑，同样渴望重振对价值问题的思考。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第二阶段的建构中特别注重与国外学界的交流对话，但与国内学界其它学科的沟通似乎显得相对薄弱了一些。实际上，国内学者出于相同的语境和背景，会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问题意识”抱有更多理解之同情，因此也就更能看到这一话语的价值。换个角度讲，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目前形成的学术共同体中，清一色都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而一种批评话语的建构需要有更为多元丰富的学术力量，也需要接受更多学科的检验。与其在自己的园地里各自为战，不如为了共同的目标联合起来。窃以为，加强与同道者的切磋琢磨、激荡交流，借鉴吸收他们观点中的合理成分，共同打造中国独特的文学批评话语，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开拓更大空间的必由之路。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批评话语的建构都不可能是全新的创造，而必然是各种话语资源与时代语境相结合的产物。文学伦理学批评建构者怀着深厚的现实关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打造这一理论话语，筚路蓝缕，试图为中国的文学批评开新立派。有理由相信，这一理论将越走越好，发出越来越强的“中

¹ 除上文提到的王鸿生先生外，还有专注于叙事伦理研究的伍茂国先生等。

国声音”。

Works Cited

- 段俊晖：“伦理批评的2种范式——列维纳斯的伦理形而上学与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4(2008):87-90。
- [Duan Junhui. "Two Paradigms of Ethical Criticism: On Levinas'Ethical Metaphysics and Habermas'Discourse Ethics." *Journal of Chongq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4 (2008) : 87-90.]
- 黄开红：“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访聂珍钊教授”，《学习与探索》5(2006):53-61。
- [Nie Zhenzhao and Huang Kaihong.“On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An Interview with Prof. Nie Zhenzhao.”*Study and Exploration* 5 (2006): 53-61.]
- Jane Adamson,et al.ed. *Renegotiating Ethics in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Theory*. Cambridge U P, 1998. 1-17.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5(2004):16-24+169。
- [Nie Zhenzhao.“Ethical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A New Perspective.”*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04): 16-24+169.]
-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2006): 8-17。
- [—.“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Moral Criticism.”*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06): 8-17.]
-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和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 12-22。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 ：“序言：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 [—.“Prefac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New Perspective*. Wuhan: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6:1.]
- ：“勤学求真，创新求是：漫谈我的治学之路”，《当代外语研究》11(2014) 1-7+80。
- [—.“Study for Truth, Innovate for Truth: A Random Talk about My Way of Learning.”*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11 (2014) 1-7+80.]
- ：“谈文学的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文学评论》2(2014) : 13-15。
- [—.“On the Ethical Value and Teaching Function of Literature.”*Literary Review* 2 (2014) : 13-15.]
- ：“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5(2017) : 27-34。
-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Brain Text and Brain Concept in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7): 27-34.]
- 王鸿生：“文化批评：政治和伦理”，《当代作家评论》6(2002):43-50。
- [Wang Hongsheng.“Cultural Criticism: Political and Ethical Dimension.”*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6 (2002): 43-50.]
- Wayne C. Booth, *The Company We Keep: An Ethics of Fiction* (Berkeley and London: U of California P,

1988), P7-8.

夏延华、乔治斯·梵·邓·阿贝勒：“让批评理论与世界进程同步”，《外国文学研究》6 (2015): 170-172。

[Xia Yanhua , Georges Van Den Abbeele .“Synchronize Theory with the Course of the World: A Synopsis of the 1st UCI Critical Theory Conference.”*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5): 170-172.]

杨革新：“《艺术与伦理批评》：美国伦理批评的新动向”，《外国文学研究》6 (2011): 32-35。

[Yang Gexin. “Art and Ethical Criticism: A New Direction in American Ethical Criticism.”*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1): 32-35.]

张杰、刘增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多元主义阐释”，《外国文学研究》5 (2007):137-143。

[Zhang Jie,Liu Zengmei. “Interpretation of th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uralism.”*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07): 137-143.]

张连桥：“范式与话语：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与影响”，《文学理论前沿》(第十七辑)：148-169。

[Zhang Lianqiao. “Paradigms and Discourses: The Orig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No.17): 148-169.]

责任编辑：张连桥